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中)

了在华侨学校接受的教育外,就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心底里我向往着自己的祖国,盼望着祖国强大,盼望海外华侨能够真正扬眉吐气。中国站不起来,海外华侨就抬不起头来,什么时候都是海外孤儿,不仅日本人侵占中国人,就连当地日本雇佣军也欺辱我们中国人。在印尼,我们家的东西多次被抢劫,明明知道是谁抢的,母亲就是不让我还手,生怕惹怒了当地人。在中国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华侨在国外是处处受欺侮的,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

二、巴中严师教导

后来我父亲的生意做的还不错,家庭生活也慢慢好起来,吃穿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是在印尼马吉朗市念的小学,印尼日惹市念的初中、高中则考入了雅加达的巴城中学。当时雅加达有三所华侨中学,即巴城中学、中华中学和八华中学,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是非常倾向中国内地的。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进步读书会。我记得很清楚,在读书会里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第二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基本上是奠定了我此后的思想基础。

到了高中,我受国内进步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我们一些同学自发成立了进步组织。我在巴城中学读书时接触到的大部分老师都来自国内,我的语文老师叫钟士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十几年前我到香港还见到了他。教我代数的老师叫刘宏读,毕业于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他的弟弟叫刘宏谦,是教我几何和三角的老师,也是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个教我们化学的老师也是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她叫胡世查。

这些老师都很不简单。我们巴城中学的师生,新中国成立后有80%都回到了祖国。巴城中学学生的学习成绩也都非常好,我后来之所以能考上清华大学,与在巴城中学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当时巴城中学全部都是用中文教学,主课语是中文,外语是英文,课本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传过去的。虽然我是在印尼念得高中,但教我的老师是由中国去的师资,所学的教材大部分是和中国一样的。所以,我回国后很快就能与国内的教育的内容和步骤衔

接上了,教我的还有一位物理老师叫韦同芳,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大学)毕业的,教的非常好,我回国考试,成绩最好的就是物理,他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即使后来回国后我被打成“右”派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把祖国当成母亲,我也认为那是母亲打错孩子,但母亲终归还是母亲。

当年回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向往祖国。1950年已有一批印尼青年学生回国,我们1952年回国的是第三批。我们一批共有724人,由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带队,称做华侨回国学生升学团。我们回国完全是自发组织的,直接目的就是到祖国继续念书,有回来考初中的,也有回来考高中的,我是回来考大学的。我们回国的一路上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我出国是随母亲出去的,父亲到雅加达市码头接的我们,我回国也是父亲送我的。我记得当时父亲从三宝垄坐火车把我送到雅加达,然后从雅加达坐船回国。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比较困难,吃的很不好,吃的第一餐是盐粥。后来到北京也慢慢想通了,经过一些系列的思想教育,我们也了解到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可



石琪高挥笔写书法

能很舒适,我们的心绪也逐步平静了。

在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兼了一些职务,但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到了北京,在华侨补校学习和工作了一年后,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我的作文考的很好,作文题目是“记述一件新人新事”。我写的是朝鲜战场上的空军英雄张积慧。在补校学习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听了很多英雄模范人物的报告,我对赴朝参战的空军英雄张积慧的报告印象最为深刻。他在赴朝参战以前驾驶的飞机的时间才有两个多月,就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勇敢和智慧,他打下了美国的王牌飞行员。这名美国王牌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击落过德军的十几架飞机,却在朝鲜战场上败在了我们青年空军英雄张积

慧的手里。我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作为我考清华大学的命题作文,结果得了高分。另外,我的物理也考得很好。结果我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与我同时考进清华大学的巴城中学毕业生还有十几个人。

三、被打成右派

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从小就定型了,直脾气,干事情执着,天生爱打抱不平。我回来后在清华大学念了四年半的书,1958年毕业前夕就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被带戴帽分配到广西进行改造。在反“右”初期,我算是积极分子。“反右斗争”开始时并没有搞得那么极端,讲的是教育为主,就是通过运动使大家都受教育。开始时说在教师队伍中不搞反“右”,后来反“右”斗争扩大到教师中,又说在学